

# 棋品与人品

资料图片

唐朝,是第一个为棋手设置官职的时代。当时的棋手叫“棋待诏”,虽然是个九品芝麻官,但属翰林院。
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酷爱围棋,且对自己的棋技相当自负,他曾写诗夸口说:“棋罢嫌无敌,诗成愧在前。”白居易的好友,只当了6个月短命宰相的诗人元稹,也喜欢下棋,只是他的人品向来不为人所称道,从下棋中就可看出。《棋天洞览》记载:“元稹与李杓直棋,稹已败,乃窃枚直数子咽之。”败局已定,为要面子,元稹竟将李杓直的数枚棋子放在口中。

同样做过宰相的王安石是典型的输不起的角色。他与人下棋,常常未经缜密思考就匆忙落子,当发现自己快要输的时候,就把棋子全部收起来,说:“下棋只是游戏玩罢了,何必劳神苦思。不如算了!”

相比之下,还是苏轼对一生下棋之事看得开,他自评一生有三件不如人的事情,一是喝酒,二是唱歌,三是下棋。他自知棋技不如人,对输赢看得很淡。一般人下棋,赢了高兴,输了败兴。苏轼却无论是赢是

输,都很高兴。用他的话说:“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。”他将人生看得透彻,其实人生就像一盘棋,下棋的乐趣在于过程,不在于结局。

欧阳修也是个棋迷,他自称“六一居士”,他在63岁那年写的《六一居士传》中,对“六一居士”的来历有一番交代:“藏书一万卷,金石遗文一千卷,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,而常置酒一壶”,“以吾一翁,老于此五物之间,是岂不为六一乎?”在滁州之任职时,欧阳修身边应该聚有不少围棋爱好者。他们常常携带棋具,在山亭之中摆设战局,《醉翁亭记》记载的欢乐盛会让人向往。

如果说棋占了欧阳修生命的六分之一,那么对于同时代的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来说,棋怕要占到四分之一。黄庭坚曾给侄儿写信说,完美的人生,应该是从有限的光阴中拿出三分之一谋生,三分之一读书,三分之一下棋喝酒。

当代杂文大家、诗人聂绀弩,才华盖世,不拘小节,胡乔木称他是中国诗坛的“一株奇花”。他嗜好围棋,在《香港

文汇报》任职时,常与梁羽生捉对厮杀难分难解,物我两忘,有时连他每天必写的时事评论也丢到了脑后。害怕受责,他与梁羽生私订“保密同盟”,传为笑谈。

三国魏时的阮籍与朋友下棋之时,家人跑来送信,告知阮母去世。朋友丢棋欲走,可阮籍坚决不干,非拉着下完不可,可谓“善始善终”的典范。但不能因此说他对母亲没有感情,之后他狂饮酒三斗,大哭不止,吐血数升,体重骤减。

由阮籍我忽然想到梁实秋先生,梁先生也是棋瘾颇大,作有妙文《下棋》,阐述的下棋之道让人心服,实是他有亲身体验。据梁实秋之女梁文茜回忆,父亲的两个爱好,一个是吃,一个是下棋。梁实秋先教会夫人程季淑下围棋,后来又教会了三个孩子,其中以儿子文骥棋艺最高,但他喜欢悔子,父子两人常为此红脸,谁也不认输。

当年梁实秋与友下棋时得知闻一多被暗杀,义愤填膺,拳击棋盘,一只棋子掉到破地板缝里,再也没有抠出来。(陈雄 来源:青岛日报)

## 寿数忌讳

人的寿数即年龄,古有称谓。

《论语·为政》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。”

《庄子·盗跖》:“人,上寿百岁,中寿八十,下寿六十。”还有将三十至百岁细分为:三十岁叫“壮寿”,四十岁为“强寿”,五十岁为“艾寿”,六十岁为“耆寿”,七十岁为“稀寿”,八十岁为“耄寿”,九十岁为“耋寿”,一百岁为“期颐寿”。有称八十八岁为“米寿”,谓拆“米”字为八十八是也。

在民间,寿数的表达有种种忌讳:首先忌言四十五。俗话说:“人到四十五,庄稼去了暑。”据《北平风俗类征·语言》引《朔纪》云:“燕人讳言四十五,人或问之,不曰‘去年四十四岁’,而曰‘明年四十六岁’,不知何所谓也。”

又据《汴梁琐记》载:“汴地民间流传:包拯奉命陈州放粮,中途遇盗,乔装忘八(江湖中下九流妓女的别脚),逃出险境,幸免于难。”其时包拯正值四十五岁,民间认定四十五岁这一年当属厄运,因而忌言四十五岁,凡遇者皆以“明年四十六岁”以避之。

忌言四十九。人逢四十九岁,民间习惯说这一年是个“大疙节头”(大坎儿)。原因是这年是人的本命年,俗有“本命年难过”之说。所以人到四十九岁一般都言“明年五十”或四十八周岁,有意避开四十九。忌过六十六。民间俗谚云:“年纪六十六,阎王要吃肉。”豫西一带老人六十六岁生日时,儿媳妇要包六十六个小饺子,如果老人能一顿吃光,就预示着能平平安安迈过这个坎儿。河南大部分地区,老人过六十六岁生日,闺女要送一块肉来,为的是要用这块肉抵上阎王爷的债,豫东南一带,还要把闺女送来的这块肉,切成六十六块,最后让老人吃下去,意思是让老人顺利地闯过“六十六”这一关。

忌言七十三、八十四。传说孔子卒年七十三,孟子享年八十四,因此人们以为这两位圣人都闯不过的关口,一般人就难闯过,所以民间将这两个岁数叫做“损寿”,出现俗语:“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。”一旦越过了这两个岁数便成了寿星,一般都有望活到百岁。

(钟正和 来源:泉州晚报)

## 匡衡凿壁偷光之后

匡衡“凿壁偷光”刻苦读书的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,这也许与他以后官做到了宰相不无关系。《汉书》说他家“父世农夫”,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,匡衡显然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。特别在《诗经》的研究上,得到了人们的认同。《汉书》注说他名衡字鼎,所以“诸儒为之语曰:‘无说《诗》,匡鼎来,匡说《诗》,解人颐。’”

汉元帝即位后,一改汉宣帝“不甚用儒”的做法,于是匡衡得到了与他有着相似经历、同样是“家世以田为业”的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儒臣的赏识,加上车骑将军史高,要利用他的名声抬高自己,而向皇帝推荐了他。于是汉元帝封他为博士、给事中,丞相韦玄成病逝后,匡衡接替其位,受封乐安侯,登上了人臣的最高峰。汉元帝认为没有老婆的宦官“精专可信任”,所以“事

无大小”,都让“少坐法腐刑”的石显去处理。但正如盲人的听力会格外好一样,太监不法的欲望也特别强烈。匡衡辛辛苦苦得来的官位,自然也不能因为要守儒家的说教,而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于是出现了人格的分裂,“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显,不敢失其意”。等到汉元帝一死,见石显的靠山一倒,他又立即对他落井下石,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就参劾他,“位居大位,知显等专权势,作威作福,为海内患害,不以时白奏行罚,而阿谀曲从,附下罔上,无大臣辅政之义”,既然参奏了石显,却“不自陈不忠之罪,而反扬着先帝任用倾覆之徒,罪至不道。”继位的汉成帝不仅没有怪罪他,还表彰他说:“君尊修法度,勤劳公家,朕嘉与君同心合意,庶几有成。”

他在上书汉元帝时说:

“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,则民不争,好仁乐施,则上不暴,上义告节,则民兴行,宽柔和惠,则众相爱。”大有要皇帝、大臣为民作榜样的意思,可是他的儿子越骑校尉匡昌却“醉杀人”,被关进了牢里。结果被人发现:他的另一个儿子却要“和越骑官属”一起,去牢里把他抢出来。而封他为乐安侯时,因为地图的差错,在给他封地三千一百顷之外,他还一直冒领着其他四百顷的租谷,十多年后重新勘界,他又百般阻挠,继续强占,终于受到了司隶校尉和少府廷尉的劾奏。汉成帝心里明白得很,君臣正如主仆,仆人多半是想要在主人那里多占些便宜的。不过这回也许是要考虑内部的平衡,而且匡衡年纪也大了,所以让他“丞相免为庶人,终于家”就完事了。(龚敏迪 来源:香港文汇报)

## 官场的装聋作哑

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起用张琼担任殿前都虞侯这一重要军职,但仅过了两年,这位救过赵匡胤性命、性情耿直的都虞侯便遭人诬告,最后被迫在狱中自杀身亡。之后,这一要职由杨信接替。

杨信上任不久,就突发哑病,口不能言。好在杨信有个贴身家童能够准确“破译”杨信的哑语,每当杨信入朝上奏,或传令军中,只需杨信手摩挲几下,家童就能把杨信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,丝毫不影响杨信运转自如地掌控军队。于是赵匡胤更加信任杨信,不仅保留了杨信的官职,而且于翌年授予杨信节度使一职,后又升殿前司的高级职位也交给了他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,哑了11年的杨信竟然在临死的前一天奇迹般地“康复”了,向前来探望他的宋太宗赵光义(赵匡胤的弟弟)声情并茂地表达了他对两朝

知遇之恩的深切感念。

至此,人们才知道杨信在装哑,为了避免其前任的覆辙而装哑。

事实上,杨信“装”来了荣华富贵,“装”来了大权在握,并以善终。

如果说宋朝的杨信装哑装得“精彩”,那么清代的王文韶装哑也装得“奇妙”。王文韶历经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,在地方做过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,在朝廷做过尚书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,官运亨通,显赫一时。据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记载,王文韶一进入清廷权力中枢军机处后,就“耳聋愈甚”。一日,二大臣争执一事,相持不下,西太后问王文韶意见如何,他莞尔而笑,不作答复。西太后再三追问,他仍笑而不答。西太后说:“你怕得罪人?真是琉璃蛋!”他仍笑如前。

很显然,王文韶装聋意在

躲事避风头,首鼠两端,谁也不得罪,以此来避免被同僚倾轧。可以说,王文韶的装聋是当时清朝官场圆滑趋避之风的一个缩影。但与杨信装哑不同的是,王文韶的装聋被人识破了,并因其圆滑模棱至极,被讥为“琉璃球”、“琉璃蛋”。但识破归识破,讥讽归讥讽,王文韶做官却做得八面玲珑、左右逢源、只升不降。

可见,在专制政体下,官员要保命保官保富贵,就得装,像杨信那样装哑,像王文韶那样装聋,必要时为了活命,还得装傻,装病,甚至装疯,装死也在所不惜。装好了,性命无忧,官位无忧,富贵无忧,相反,如果不装,干得再好,政绩再突出,一不小心被怀疑有野心,或一不小心得罪了同僚,幸运一点,落个罢官的结局,要是倒霉,说不定会身首异处,甚至满门抄斩。(孙存准 来源:济南时报)

## 《陋室铭》与它的前奏

唐代诗人、著名作家刘禹锡,字梦得,洛阳人,贞元九年进士,官至太子宾客、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因他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宠臣,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。

按当时的规定,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房子。可是,和州知县见刘禹锡被贬而来,自无好处,便多方刁难。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偏僻的县城南门,面江而居。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,不但没有埋怨,反而很高兴,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:面对大江观白帆,身在和州思争辩。

他这一举动气坏了知县,知县令衙内书吏将刘禹

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更僻远的城北门,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。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,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,自是别有一番风景。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,依然安心住下,读书作文。

知县见他仍是悠然自得,又把刘禹锡的住房调到城中,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。半年时间,刘禹锡连搬三次家,住房一次比一次小,最后仅是斗室。便想这狗官实在欺人太甚了,遂愤然提笔写下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佳作《陋室铭》,并请人刻于石头上,立在门前。流传千古。(李宣奇 来源:城市快报)

## 主人为何叫“东道主”

公元630年,晋文公和秦穆公的联军包围了郑国国都。郑文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向老臣烛之武求救。烛之武想了很久,决定深入险地,凭自己的口才设法解围。

当夜,烛之武趁着天黑叫人用绳子把他从城头上吊下去,私自会见秦穆公。晋国和秦国是当时的两个大国,烛之武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明争暗斗的矛盾。他对秦穆公说:“秦晋联军攻打郑国,郑国怕是保不住了。但郑国灭亡了,对秦国也许并无一点好处。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讲,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一个晋国,秦国要越过晋国来控制郑国,恐怕是难以做到吧。到头

来得到好处的还是晋国。”

秦穆公听了,觉得烛之武说得十分有理。正在动摇之间,烛之武进一步说道:“要是您能把郑国留下,让他们作为你们东方道路的主人,你们使者来往经过郑国,万一缺少点什么,郑国一定供应,做好充分的安排,这有什么不好?”

秦穆公终于被烛之武说服了,他单方面跟郑国签订了和约。只剩下晋国独木不成林,晋文公无奈,也只得退兵了。秦国在西,郑国在东,所以郑国对秦国来说自称“东道主”。后来,这个词就泛指招待迎接客人的主人了,一直流传到现在。(陈景胜 来源:泉州晚报)

## 水浒人物姓名趣谈

《水浒传》梁山众多好汉的姓名与绰号语义相悖,作者妙用曲笔,内藏深意,旨在烘托铺垫梁山起义军最终被招安的悲剧命运。试举数例——

前寨主“托塔天王”晁盖,任他托塔天王的本事再大,但已被“朝廷”“盖”住,动弹不得,难有大作为。

起义军领袖人物“及时雨”宋江,这“及时雨”不下到田里滋润禾苗,却白白“送”到“江”里,岂不口惠而实不至?

军师吴用,绰号“智多星”。智谋虽多,但最终也是白忙乎!“无用”两字,已盖棺论定,后更成民间俏皮话:“梁山军师——无用”。

负责财政的头领“小旋风”柴进,一阵“小旋风”把“财”都吹“尽”了。没了财富,柴大官人难为无米之炊。

## 包公“嫂娘”原是儿媳

在中国传统戏曲里,包拯将“把他抚养成人”的嫂子称为“嫂娘”,以显示他对把自己“养育成人”的嫂子的敬重,其实历史上真实的“嫂娘”原型,是他的儿媳。

历史上的包拯直到30多岁时其父母还健在,宋仁宗天圣五年,29岁的包拯,考中第一甲进士,并被授予官职,然而因父母年事已高,恪守孝道的包拯选择弃官回家赡养老人,直到父母去世,自己守孝3年后才出来做官,这时,已经39岁的包拯才正式踏上仕途。

包拯有一妻一妾有二子二女,长子叫包□,其妻为崔氏,“节妇,淮阳崔氏妇,年十有九,嫁为枢密副使包孝肃公长子太常寺太祝妻”。

然而,“子□,先公卒”,即长子包□先包拯而去。包□和崔氏在一起只生活了两年,死的时候留有一个遗腹子,后取名包文辅,不幸的是包文辅早年夭折。崔氏没了丈夫也没了孩子,包拯不忍看她孤苦一辈子,允许其再嫁。然而,崔氏却当着包拯的面发誓:“生为包妇,死为包鬼,誓无它也”,拒绝改嫁。

后来,包公的妾为他生有一子起名为包绶,晚年得子自然高兴异常,然而在包绶五岁的时候,包拯就驾鹤西去,临死前包拯嘱托将包绶的生母遣返回家,包绶便由崔氏代为抚养,崔氏待他形同己出,疼爱异常。懂事后的包绶也以“母礼侍之”并称之为“嫂娘”。

(来源:武汉晚报)